

科技文摘报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第1846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EST
科技部主管 科技日报社主办 科技文摘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04
邮发代号:1-178

出售本报合订本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报2016年合订本已印制完成,售价120元;2015年合订本数量不多,售价100元。如15年、16年两本同时购买,可优惠到180元一套。有需要合订本的个人和单位,请与我们联系。

通过邮局汇款到:北京复兴路15号科技文摘报社
收款人:陈启霞
邮政编码:100038
咨询电话:010-58884190 010-58884135

海上科考:制度化科普缘何缺位? (2版)

警惕“潜伏”的二维码扫码陷阱 (2版)

从技术成就看“李约瑟之问” (3版)

剧变时代,未来和现在的距离实在太短

特别
荐读

小心励志的“保安逆袭”
神话也可能成人生毒药

详见3版

吃药能控制生男生女?
朋友圈又现“神药”

详见10版

中国创新井喷
自有内在逻辑

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报道,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商标申请量已领跑全球,众多中国企业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开展研发,专利申请势头迅猛。而就在前几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科技企业创新时,还不忘戴上“山寨”的帽子。

一向喜欢用比较静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西方,对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中国科技成就还不太适应。因为按照熊彼特等西方经济学家的逻辑,创新发生的重要前提是要有“积极不干预”的科研氛围和生态,但中国领跑全球的科技企业主体中,既有华为、腾讯等民营巨头,更有中车、中航工业、国家电网等超级央企。

中国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其内在逻辑也值得总结。一般认为,中国科技取得突破性进步,得益于政府对科技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环境因而得到显著优化,中国民间潜藏的创新与营商禀赋被激发出来,民营科技企业获得快速发展。

加上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市场竞争等因素,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基于使命驱动的创新和产业化效率的不断改进,共同构成近年来中国科技“井喷”的动力。

当然,任何科技创新都需要有相当规模的研发投入支持,而中国这些年在研发投入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如今,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201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5440亿元,占GDP比重已达2.1%。

放眼当下全球科技发展潮流,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的创新性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从来不缺创新禀赋的中国企业,当然需要保持开启颠覆性革命的创新热情,但同时也需要保持理性与建设性,避免浮躁情绪。中国科技及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相关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主体对发展创新性产业的高度认同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

《环球时报》2017.6.1 文/章玉贵



1978年5月杨钟健先生在周口店第一地点洞底



1927年6月1日杨钟健先生于瑞典乌普萨拉



1922年杨钟健先生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进行野外实习测量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杨钟健先生?

□ 张劲硕

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还是一位特别值得我们纪念的科学家的生日。他就是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杨钟健先生(1897.6.1~1979.1.15)。

难道没人知道
杨钟健先生吗

5月31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6月1日晚上的“博士有话说”活动报名者远不如以前,我听到以后心里很沮丧。这一期我们要做的主题是“大丈夫只能向前——纪念杨钟健先生诞辰120周年”。

“博士有话说”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主办,由我主要参与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举办3年来,从最开始由我单人单讲,转变为有杨毅、高源、张小峰等多位博物达人共同参与表演的形式,后来又改版升级为邀请博物学、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博士共同讨论一个科学话题的形式。在举办的20多期活动中,只有一期报名最火爆,就是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作为嘉宾的一期。当时的情况绝对是“手慢无”,几分钟之内就报满。我想原因很简单,“河森堡”太有名了,人长得帅,讲得又有意思,当然应该受到热烈欢迎,这个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

而我们要做的这一期,关于杨钟健先生,请来的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学家,或是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也许这样的内容或嘉宾不足以吸引人,所以报名者寥寥?难道没有人知道杨钟健先生吗?难

道没有人喜欢来现场瞅一瞅老科学家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纪念活动做错了,还是我已经与这个时代脱节?抑或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他的照片一直悬挂在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

首先,我先说一下杨先生名字里的“钟”字,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写成这样。现在,按照2013年颁布的最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把鍾、鎧、昇、𦵈等很多用于名字的汉字,都列入字表,成为规范的简化字,或者把一些繁体字接受为通用规范字。这些字也已收入《新华字典》。所以,杨先生的名字应该写为“杨钟健”,这种情况与钱锺书、锺叔河等人名字中的“鍾”是同样的情况。

杨钟健先生的名气主要在学术界,先生在恐龙研究、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的研究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人,被誉为“中国恐龙之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今天有这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喜欢恐龙,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恐龙研究的第一人是谁。是杨先生的工作,让国人了解到中国有众多的恐龙化石,也是杨先生热爱的科普事业,让更多的公众通过科普文章、博物馆,熟悉恐龙以及其他古生物。

杨钟健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至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受翁文灏先生之邀回国,并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

发掘,之后才有的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等人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之后,他与德日进、裴文中、卞美年等人对我国多地的地层和化石进行调查和采集,划分红色土地层、提出山旺统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在抗战时期,杨钟健先生转至重庆、四川工作,并前往西部省份进行野外工作,即考古学人讲的“田野调查”。后来,杨先生撰写的著名的科考游记《西北的剖面》、《抗战中看河西》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就的。

解放前,杨钟健先生便担任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的理事长,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还担任过西北大学校长。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古生物研究为同行所折服,1948年即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当时的这一批院士可谓中国学术领域最权威的领袖级人物,地学界只有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朱家骅、杨钟健、谢家荣、黄汲清等七人。杨先生则是唯一一位主攻古生物学研究的地质学家。杨先生的威妥玛氏拼音为Chung Chien Young,常简写为C. C. Young,这个简写在西方同行中的名气更大,搞古生物的一提C. C. Young,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钟健先生的介绍和照片一直悬挂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这也是唯一的中国人出现在该博物馆内,得到西方博物学界的认可和纪念。(下转第二版)